

第十四章 重返苏联

我很想在国内多住些日子,但却未能如愿,政府很快就催我回莫斯科。与南京方面的高官们举行几次会议之后,我看出政府在外交方面显然大政尚未确定,倾向于等待国际形势有所好转后再说。在一次与报社记者交谈时,我暗示条条大路通日内瓦,也通华盛顿、莫斯科和东京,就看政府的决定了。

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解释说,政府没有采取行动,是因为公众舆论有严重分歧,我对他说,占往今来在任何外交问题上,没有哪一国的舆论会是一致的,作为外交部部长的职责,就是要判断什么是正确的、明智的公众舆论,如果他认为大多数人非常倾向于采取某一种政策,他就应该采取。过去北京政府有几次重要的决定就是这样作出的,最终证明所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并得到了衷心拥护。

我此次重返莫斯科时,有很多人与我同行,他们是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和他的剧团,还有影星胡蝶女士。他们此行的目的在于促进中苏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我们一行乘坐的是苏联的近海轮船,行前,国人曾在上海国际饭店盛情欢送我们,经4天航行,船在浓雾笼罩中抵达海参崴。这里真是一个良港,海水很深,周围环山。

但海参崴市内却是一副破败的样子,街道和房屋都很陈旧。我们在那里小住数日的那个旅馆条件颇差,卫生与服务甚至不能

与国内普通旅馆相比。我国驻海参崴的总领事,精通俄语,十分了解西伯利亚的情况,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侨民。总领事与地方当局关系很融洽,我们多次出席了地方当局为我们举行的聚会,少不了发表演讲和集体合影之类。在海参崴一共只有3位总领事,其他两位是日本和德国驻当地总领事。那时,除中、日、德三国外,其他国家还不被允许在那里设领事,后来,苏美建交后,莫斯科的美国使馆派出一位领事常驻海参崴。

总的来说,苏联人民没有什么种族歧视的表现,无疑这主要是因为苏联国内民族众多,特别在中亚地区;但苏联政府却并不善待外国侨民和普通旅游者。除了那些已信仰共产主义,并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之外,我国和其他外国人很少能受到欢迎。这些人的生活痛苦不堪,常会遭到莫名其妙的迫害,甚至被以令人无法相信的罪名流放到遥远的地方去。

这里还经常会发生有人失踪的事情,尽管使馆或领事馆努力寻找,但仍弄不清楚他们的去处。当被秘密警察逮捕后,被捕人就由特别法庭审讯,在拘留阶段,不允许领事去探视。审讯时,领事也不允许到庭。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外国人在苏联也不可能像在其他国家那样生活,因为苏联一切都国有化了、社会化了,外国人那里无法得到工作或独自办厂做买卖。如有存款,不允许汇出苏联寄回老家,离开苏联时,也不允许把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卢布纸币带出境。

有一次,大使馆为愿意移居新疆的我国侨民办理离境手续,那时,新疆是我国唯一向他们开放的地区,苏联当局不允许他们携带任何工具和手动机械,不过,倒是允许他们的苏联籍妻子同行,也许是可以减少粮食消费吧。

我离职几年之后,我国驻西伯利亚领事馆有报告说,苏联政府借口外国侨民不再被允许居住在“国防”重地,把我国在西伯利亚的侨民都清走了。苏联政府采取这样极端的做法主要是害怕日本人,日本人就在苏联边境一侧的满洲,并且,日本人可能在苏联境内招募第五纵队。^①不管怎样,我国侨民曾为建设西伯利亚付出了许多血汗,而他们却为此饱受了太多的苦难,甚至最后还要失去他们微薄的家业。也有一些山东人,坚定地留在苏联,宁愿忍受难以形容的艰难困苦,去追随与他们的思想和社会背景格格不入的共产主义,但大多数人去了新疆。

中国共产主义者在苏联很受优待,我们遇到过一些,他们不仅与苏联人一样可以在各地工人疗养院休假疗养,而且与苏联党的领导人一起坐在剧院包厢里看戏。在公共场所,他们遇到我们时就装作蒙古人,不和我们打招呼,这是他们的规定。

我们一行在领事馆官员陪同下,先访问了伯力。与海参崴相比,伯力比较繁荣,富有生气,有一些新的建筑和现代化的街道,不过,在那里度过的两三天里,我们仍愿意在火车的车厢里过夜。在地方外交人民委员会代表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一些地方,其中有一个新建的炼油厂,附近库页岛的原油可以运到这里来提炼,不必再远运巴库或巴统了。此外,我们还参观了电疗专科医院。

我原拟拜访著名的布廖赫尔元帅(即加伦将军)^②,但却与他失之交臂,当时他正在莫斯科访问。我们在西伯利亚停留的最后

① 第五纵队,原意指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隐藏在后方的反共和政府的间谍、叛徒等内奸,后成为一国在其他国家收买的叛徒和派入的间谍的通称。——译者

② 加伦将军曾于1923年来华,任广州政府军事顾问。——译者

一站是赤塔,这是从满洲里和海参崴来的火车的终点站。赤塔是个宁静的小城,地方当局作了充分的准备来接待我们,旅馆打扫得很干净,我们住的房间粉刷一新。不久,我们同行中的其他人从海参崴乘快车到达这里与我们汇合。我们一起登上长途列车继续前往莫斯科。在新西伯利亚,我国设有总领事,新上任的总领事到车上来欢迎我们,送来了一些中国食品,并简要介绍了当地的情况。

位于莫斯科的我国大使馆经重新装修,焕然一新,地毯、字画以及红木家具和宫灯都是从国内运来的,其他家具来自柏林和巴黎,一切准备就绪,迎接我们的到来。关于这幢使馆大楼还有一个与我们有关的故事。大楼原主人在革命前是个富商巨贾,革命一开始,他就逃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去了,他的妻子还留在莫斯科,他一直给他妻子邮钱。后来,他手头拮据,就写信告诉他妻子说,家里有一大批珠宝藏在浴室的墙壁里和地下室的地板下。可是,这封信落到了警察手中,警察挖开了浴室的墙壁和地下室的地板,没收了全部珠宝。说起来有点遗憾的是,在此事发生之前,我国首任代办居住该处达两年之久,全然不知自己置身宝库之中。挖掘珠宝的事发生在首任代办因中苏断交而去芬兰之后。那时,我们真是太需要这样一幢大楼了,因为我们的艺术家来莫斯科访问,有大量的招待工作要做。

此次,梅兰芳的首场演出安排在使馆的大客厅里,这里除了舞台和乐队的地方外,还可以容纳 160 位客人。首场剧目为“刺虎”,舞台的布景、华丽的戏装、新奇的音乐,和剧目情节,在苏维埃首都引起了轰动,成为人们不断谈论的话题。后来,梅兰芳还在莫斯科大剧院上演了多出京剧,以及舞剑、舞缎带之类,演出持续了 10 个晚上,受到热烈欢迎,剧院每晚都爆满,剧票难以买到。使馆在剧

院包了两个包厢,用以招待全体外交使团成员,看完剧又请他们在使馆用晚餐,这时,梅兰芳先生和胡蝶女士等也来与宾客见面。

梅兰芳这次出访莫斯科,得到了南开大学张彭春教授的极大帮助,另有一位中国戏剧家充当梅兰芳的顾问。李维诺夫夫妇特别喜欢看梅兰芳演出,几乎每晚都在剧院前排就坐,其他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由年轻的中国人陪同坐在包厢里看戏,我们对那些年轻的中国人只当作没看见,他们一般在帘子后面不露面。

梅兰芳演出的剧目中,最受欢迎的是关于一个老渔翁的故事。^①老渔翁交不起地方官征收的苛捐杂税,他和他的村里人都因交不起税而受到惩罚,于是,老渔翁杀死了万恶的地方官,带着他年轻美丽的女儿逃跑了。由于这个故事具有“革命”意义,因此受到观众们的热烈赞扬。梅兰芳还擅长作水彩画,他的画作为纪念品赠送给苏联友人,大家对他的画赞不绝口。胡蝶女士主演的影片在莫斯科上演了几部,虽然人们只能从银幕上欣赏到她的表演,但她那甜美的笑容和温柔贤淑的举止倾倒了所有的观众。在特别为她举办的聚会上,她为大家演唱歌曲,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两位艺术家访苏获得巨大成功,促进了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

莫斯科有很多文化艺术场所,如博物馆、美术馆(美术馆不仅收藏有本国的,还有西欧的美术作品)、古老的教堂和修道院(其中一些已改成了博物馆)。这些文化艺术场所中,莫斯科大剧院和各种剧院最受推崇,因为苏联的歌剧享有盛誉,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的歌剧能与之相比。至于芭蕾,人们在法国的巴黎或里维埃拉也能欣赏到同莫斯科芭蕾同样优美的舞姿。在莫斯科上演的气势宏

① 即《打渔杀家》。——译者

大的苏联歌剧,其音乐、演唱、服装、舞台布景,与其他地方相比,不仅水平更高,而且更生动逼真。

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其他国家的都城,也看过一些根据中国的生活和故事改编的戏剧或歌剧,但往往音乐、服装古怪可笑,不伦不类,布景甚是糟糕,情节又过于离奇。

对于看惯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歌剧的人来说,他们认为俄国歌剧不好,特别是服饰和布景不够堂皇富丽。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不仅经常邀请外交使团去大剧院看歌剧,也邀请去内部影院看新影片。当时公共电影院常常客满,外国人很难买到票,即使有票,也难称享受。后来,美国大使布力特布置好了新宅,常常邀请我们去看美国电影,我们很喜欢看,因为在莫斯科很少看到。

在我首访莫斯科两年之后,也就是1935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成果显著。地铁的建成,使城市交通大大改善;出租车车辆充足,使人倍感方便;很多农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市场而不是出口国外,所以食品供应的限制也放宽了。新开的商店里摆满了过去从未见过的苏联本国生产的工业品,质量很好,价格合理。当然由于受气候恶劣影响,有些东西还很难买到,如鲜花、热带水果和蔬菜等。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使工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重工业,在汽车、拖拉机、飞机、卡车等制造方面尤其突出。有一段时期,有不下4000名外国工程师在苏联工作,帮助苏联重振经济。西伯利亚铁路铺设了双轨;土西铁路沿着我国新疆西部边界的一段也已修成;利用伏尔加河连通首都至大海的“莫斯科运河”也已开通,这些都是在公共工程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总的来说,虽然在交通建设尤其是铁路、公路建设方面成绩不小,但是由于其他方

面的建设还跟不上,因此,货运和客运并不繁忙。近年来,我国修筑的公路已超过苏联。苏联的铁路客运,除了快车外,普通客车常晚点,不太舒服,也不够干净。

每年的5月1日和11月7日,莫斯科都要举行两次盛大的阅兵式,陆、海、空三军都参加,坦克部队驾驶几百辆坦克,其他机械化部队也装备齐全,浩浩荡荡,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通过红场,同时,排成密集队形的空军飞机轰鸣着掠过红场上空,构成了一幅壮观而又令人难忘的画面。

阅兵式队伍过后,是举着旗子的群众游行队伍,随后是男女运动员队伍,队伍中有的扛着共产党领导人的巨幅画像,有的扛着讽刺外国政要的漫画,最后是各种标语牌和彩车。整个游行队伍五彩缤纷,富有特色,而规模如此之大,为我有生以来所仅见。与莫斯科游行相近的,是我学生时代在华盛顿看到的美国总统就职仪式那天的大游行。

据估计,有150万人参加莫斯科游行,在那一整天里,莫斯科城有一半人在该城的主要街道游行,所有的车辆都得停驶数个小时。此外,当举行常规的军事演习,或著名的哥萨克骑兵表演马术,或伞兵表演集体跳伞时,通常也都邀请外国使馆武官前往观看,这些表演当然不是单纯的表演。

军人和工厂工人的待遇相当不错。军人穿着长大衣,高筒靴,非常精神,个子也显得比本人高,有时,也能看到穿着军人制服的年轻女军人。工人们的工资看似一样,但实际上却有差别,因为劳动模范能得到奖金,并享受各种特殊待遇,如免费戏票等。过去帝俄时代的许多漂亮的避暑行宫、豪族的休闲别墅、教士的幽静道院,现在都已改为工人休假或疗养的场所。在莫斯科大剧院,你经

常会发现坐在你旁边的是一位工人,他听着优美的音乐,同时吃着三明治。

至于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两个问题最引起外国注意,第一个是宗教问题。首先有必要了解革命前俄国教会的性质和地位。从现代的眼光来看,那时的教士一般都很浅陋无知,教会尽搞些迷信的活动。教会的政策是维护和加强沙皇的统治,反过来,教会得到朝廷的大量恩赐,包括土地,各种礼物等,变得非常富有。当参观那些已改作博物馆、或反宗教陈列所的古老教堂时,可以看到许多奇珍异宝,如名贵的珠宝、绘画、圣像、金银器皿等等。统计图表还显示了教会拥有的大量的地产和房产。那时教会宣扬的种种所谓不可思议的现象,现在也都被揭密演示,无非是牧师操纵粗笨机械制造出来的,用以欺骗无知的愚民。无怪乎革命领袖憎恶教会的这些行为,要向宗教宣战。当然,宗教是宗教,教会是教会,教会的问题不能怪罪宗教。这里我们又有一个关于教义的实例,教义本身是好的,但后来那些教士的行为玷污了纯洁的教义,应受到严厉谴责的是那些教士,而不应是宗教。尽管苏联政府严厉声讨宗教,但是老人们仍然爱去教堂,星期日的教堂里挤满了祈祷者。祈祷在苏联是被允许的,但布道被认为是一种宣传而不允许,男女青年们因为所受教育的关系,宗教观念极为淡薄。

另一个有关社会制度的问题是家庭问题。家庭是否已被破坏?孩子们怎么样了?婚姻是否还有效或还存在?离婚情况怎样?这些问题曾令苏联以外的大多数人困惑不解。在城市生活中,由于住房紧张,家的问题必然相当棘手。当一个家庭只有一间或两间房间时,这个家实在不能看作是一个理想的家。这里的住房只是解决了睡觉的地方,人们其他时间在街上、公园、公共场所

度过反倒更为舒服。不过,这里的街上很少见到老人,倒是随处可见大群的孩子,由此说明苏联国内生活仍然安逸快乐。

苏联在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如同其他地方在经历国内大动乱之后一样,家庭关系变得很松散。但是正像我在西伯利亚遇到的一位苏联医生所说的那样,“婚姻制度在苏联或在其他地方,同样都是经过几百年发展而形成的,不可想像这种制度会在10年或20年里就被破坏掉。”我所接触过的高级官员几乎都已结婚,他们的夫人都在社会上工作。

当然,离婚的事情常常发生,且比较普遍。原先,夫妻双方有一方提出离婚,就可离婚。丈夫或妻子只要将他的或她的离婚要求登记在册,负责婚姻的机关就会通知另一方离婚,于是双方的婚约就解除了,可以自由再婚。现在新的法律规定,必须夫妻双方都同意离婚,离婚才成立。新的法律与旧的法律相比,当然是一大改进,因为旧的法律虽在表面上给予男女双方同等的权利,但实际上妇女处于不利的地位。男人与女人相比,即便年岁较大,再婚也比较容易,而妇女常常连养活自己都困难,却还要抚养孩子。虽然离婚时,男方允诺承担赡养费,但离婚后男方常以无力支付为由很快停止提供赡养费,或者男方干脆消失得无影无踪,女方再也找不到他了。

人们的经济状况是否比以前改善了?回答这个问题要看人们属于哪个阶级了。过去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毫无疑问失去了一切,但是所谓下等阶级的人们,包括工人、士兵、农民等等,也即新的无产阶级,他们的经济状况肯定有改善,甚至将会越来越好。他们不仅享有很多权利,如休养、旅游、接受文化教育,这些都是他们在过去所得不到的,而且他们的孩子也能享受到在帝俄时代所享受不

到的教育和训练。工人们还可以参政议政,这更加激励了他们,为了完成五年计划,他们牺牲了很多物质享受和家庭的天伦之乐,全力投入工作。

在中国的外国人喜欢参观著名的庙宇,并喜欢花很多时间在古董店翻找古董,我们在苏联也如法炮制,参观了很多教堂和修道院。

和中国的佛教庙宇一样,在苏联,帝俄时代留下来的教堂墙壁也都是红色的,而且,红色在两国都象征幸福和好运。在婚礼上,新娘也穿红色的礼服,过去,新郎还戴王冠,就像中国新郎结婚时戴红顶官帽一样。举办葬礼时,他们 also 与中国一样,讲究用白色。

我们在苏联时,把手头的卢布都买了古董和旧书,旧书有法文的,有英文的,还有德文的,其中有些书是关于中国的。从内容来看,有属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类的著作,也有属于文学、旅游和艺术类的,后几类图书看来没有什么人翻阅过。旧书售价很便宜,即便那些装潢精美的老版本也卖得很便宜,这些书大部分是由国家没收的私人藏书。古董有很多种类,包括旧珠宝、精美瓷器、各种肖像画、老式油灯以及小摆设和小饰品等,这些东西吸引了很多外国游人,他们常常把不少观光时间花在古董店里。苏联政府建立了一个连锁店,店名叫 Torgsin,这个连锁店的分店在每一个城镇都有,出售昂贵物品,如珍稀珠宝、名画、古玩、珍本或孤本书籍等等。购买这些东西必须付外汇,或金币、银币,或金银首饰。在普通商店买不到的东西可以在 Torgsin 买到,包括食品,比如一时很紧缺的黄油。通过连锁店这一手段,苏联政府成功地回笼了大量的外汇和现金现银,当然,民众手中藏有的这点金银也就此被剥夺了。

此外,有三四个大宾馆的餐厅是外国人在下午或晚上看完演出后聚会的场所。但是,苏联的烹饪水平已大大退步了,人们在柏林、巴黎、伦敦,也许甚至在上海和天津,倒还可以吃到更地道的俄国菜肴。原因可能是苏联已经没有美食家了,所谓美食家,则是终身以品尝为主要目的。

近一段时期,苏联时兴在爵士乐队伴奏下跳舞,人们可以看到在公园里,有大群男女学跳“狐步”、“探戈”一类的交谊舞。据报道,苏联化妆品的销售量猛升,因为苏联妇女不再拒绝资产阶级所爱好的涂脂抹粉,也开始化妆了。有意思的是,人们还都兴致勃勃地尝试高加索烹调,并特别伴以高加索音乐和舞蹈。

由于汽油价格便宜,公路修得也不错,驾车兜风现在已成为很时髦的消遣。莫斯科郊外已有大片森林,不少别墅散布其间,接待游客消夏度暑。每逢节假日,莫斯科河上小舟荡漾,一片欢声笑语,游艇穿梭往来,把游人送到一个个自然景观或历史古迹。冬季自有冬季的消遣法,如驾雪橇、溜冰、滑雪等。在隆冬雪后,驾车穿过银装素裹的树林,两旁翠松绿柏的枝叶上积雪皑皑,可称世间奇观,过目终生难忘。当赛马季节到来时,装饰华美的马戏场吸引了数千爱好者前去观看,即便地上还覆盖着冰雪,人们也不在乎。

总之,苏维埃俄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经过了革命的阵痛之后,社会震荡逐步缓和下来。很多情况不会是永久性的,会慢慢恢复到过去。换句话说,好比钟摆,向一个方向摆到头后,就会开始向另一个方向摆。但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复辟,过去的情况绝不会丝毫不变地重现。就像发生在其他国家里的那些革命一样,发生在俄国的革命也将逐步趋于平缓,社会也将逐步稳定下来。

这一重大的社会实验付出了巨人的生命和物质的代价,所取

得的一些成果无疑将会被其他一些国家采纳。至于这样的成果是否可以不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或以其他不如此激进猛烈的手段来取得,现在还很难回答。只有随着时间的推进,并与其他国家的经验相比较,才能作出比较合理的评价。撇开尖刻的讥讽和冷酷的敌视,平心而论,人们对于一个甘愿付出重大代价进行如此伟大的社会实验,以求为人类发现更美好幸福的生活的民族和国家,至少应给予同情。至于苏联是否已经发现了一种优越的社会制度,人们对此看法不同,分歧极大,但是,不管怎样,每一个国家都有权采用其认为是最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只要该国不试图将之强加于他国,后者不必对本国以外的事说三道四。

世界对苏联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很快。开始时,把苏联看成一个瘟疫病人,必须筑一道墙把苏联圈起来,以防瘟疫扩散。后来发现这样做不切实际,因为很难把苏联 1.6 亿人关起来,在地球上建立如此巨大的集中营。之后,采用了另一个计划,即打开窗口,让阳光和空气进去。现在,除了拉丁美洲的国家之外,苏联实际上与整个世界都建立了关系,国联也特别为苏联保留了一个永久席位。

苏联的情况令我们中国人更感兴趣,因为两国有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两国同样面临着外部的困难,当然困难的成因不同;而在两国国内,苏联实施的两个五年计划,其动机和目的也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恢复经济的工作颇为相似,当然,苏联的建设规模和速度比我国大得多、快得多。因此,我们尤其关注苏联采用的方法、经费的投入和预期的效果。在欧洲有多个斯拉夫国家,而苏联是其中最伟大之国家,最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研究。

社交方面,苏联政府官员其实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人,他们真

诚、热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总是尽力提供帮助。可以说,看不出苏联政府官员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特别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以国际主义为指导的,与他们的交往,无论是私人还是官方性质的,都令人十分愉快。不过,这种友好交往极其有限,如前所述,由于种种原因,苏联民众与在苏联的外侨很少往来,无论是私人关系还是商务关系。这种隔离状况对双方都很不利,因为自由交往,可以使外国人更多地了解苏联人民,认识他们的伟大,而苏联人民也可以扩大眼界,增进对外部世界的了解。

在苏联首都,有三位官员与外交使团保持着密切联系,其中两位在各种聚会上经常可以见到。第一位当然是外交人民委员会礼宾司司长;第二位是教育人民委员会文化司司长,他负责博物馆、剧院和其他艺术类机构;第三位是国际文化交流局局长。他们始终十分友好,属于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事,总是尽力给予帮助。我们使馆在梅兰芳访问苏联一事上,就得到过国际文化交流局局长的很多帮助。

我们外交人员自然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成员有更多的接触。直接与我们联系的,最初是主管远东事务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先生。外交人民委员会三位委员分别使用英语、德语和法语,因此与他们会晤不是件简单的事,不过,我们与他们及他们的夫人都很熟,交往很多。李维诺夫的夫人是英国人,尽管在苏联生活了许多年,依然一派英国妇女的风格,她从事基础英语的教学。另一位副人民委员的夫人是职业医生,她自己没有孩子,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儿童医院工作,这对她来说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事实上,苏联妇女都在为社会服务。

发生在苏联的可怕的“大清洗”运动,使我们的大多数苏联朋友,包括妇女朋友都离开了人世,事情发生在我回国之后,我是从报纸上得知的,好在不在现场,多少可以减少点悲痛。使外国人感到费解的并非是逮捕了那么多曾在政府或党内身居要职的男女干部,而是指控他们的罪名在世界各国刑律上根本查不到,而且审判是秘密进行的,法庭与其说是司法性质的,不如说是政治性质的,被审人的最终命运从不公布。

苏联的政治气候阴晴多变,在苏联的各国外交官们无疑十分关注苏联的动态,他们对苏联的了解是极为重要的。可以说外交官一经驻苏,在苏联的这段经历必然构成他们职业生涯中的重要篇章,这样说绝不过分。

1935年,两位欧洲杰出政要访问莫斯科,一位是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先生(Anthony Eden),一位是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赖伐尔先生(Pierre Laval)。英国和法国使馆曾分别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两位的到来,苏联当局按照外交礼节也盛宴款待两位客人,全体外交使团成员也应邀参加。赖伐尔先生由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Leger)陪同,莱热过去曾在北京公使馆任参赞,我们一起谈论北京的人物,度过了一个有意思的夜晚,他的记性真好,还能叫出许多人的名字。那时,苏联的外交政策正是李维诺夫所宣称的:即支持国联,赞成集体安全。来访的两位政要既然是国联的两大支柱英国和法国的代表,自然受到苏联的热诚欢迎和礼貌款待。

我在那时曾访问过两个有意思的、相隔不远而性质不同的城市,一个是基辅,另一个是哈尔科夫。对这两个城市的访问不禁使我想起了德国的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基辅是历史悠久的俄式老城,城内规模宏大的拉夫拉修道院已改成博物馆。过去,基辅不仅

是那个地区的一个大都市,还是政治和国防的中心。但由于地理的和其他的原因,加上哈尔科夫是更现代化的城市,因此哈尔科夫取代了基辅的历史地位,成为那个地区的工业和交通重镇。

在苏联,铁路快车只行驶在大城市之间,总的来说是比较舒适而干净的,并且挂有餐车。但在基辅和哈尔科夫之间只有普通列车,我们也只好乘坐此车。虽然我们在车上受到特殊照应,能睡得舒服一些,但车上的情况实在不能令人愉快,车厢内十分肮脏,厕所更是污秽不堪,无法下脚。

哈尔科夫可以说是一座崭新的城市,有着用碎石铺成的宽阔柏油路、现代风格的建筑、精心规划后建成的工厂和公园等等,大体与美国中西部新兴的繁荣工业城市相似。从我们的粗略考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哈尔科夫也为工人福利做了很多事情,工人显然是实施新社会制度的苏联首先要考虑的。

我虽久居欧洲,但一直没有机会访问巴尔干半岛各国,了解他们那里的情况。我在日内瓦和莫斯科,与那里来的很多重要人物有过接触,因此我早有访问巴尔干之意。

这年夏天安排了一次出游,我的儿子和女儿也利用休假,从美国赶来与我同行。我们从巴黎出发,游程包括瑞士各大城市,然后是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维也纳过去我访问过,一晃也有20多年了。几年前我曾对孟禄博士(Paul Monroe)说过要访问君士坦丁堡的罗勃特学院(Robert College),并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我们原打算经黑海和敖德萨回莫斯科,但因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发生战争,意大利国的黑海航线都停航了。我们不得不走陆路,途经索非亚和布加勒斯特时,对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社会生活状况有了点粗略了解,最后抵达波兰首都华沙,那时,华沙正处在繁荣鼎盛时期。

回莫斯科后休息了没多久,就接到南京来的命令,要我再一次率代表团出席国联大会。这次会议极为重要,因为阿比西尼亚问题十分尖锐,法国和英国联合反对意大利。阿比西尼亚问题其实是日本入侵满洲事件的重演,但如果考虑到种族、文化、地理、商业和经济利益等方面,那么,其重要性远不及满洲问题。我们代表团成员回忆以往出席日内瓦会议的经验,此次特别注意观察和研究与事件有关的列强以及其他会员国的态度和政策。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一方面对欧洲国家进行分析排队,看他们是持同情还是厌恶态度,以及是否愿意支持国联原则;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从国联处理这个案子所采取的步骤、以及各国所持的论点中吸取经验教训,以资借鉴。

满洲一直被认为过于遥远,而这一次冲突发生的地方虽然在非洲,但是比起满洲来离欧洲近得多,并且被认为关系到欧洲的重要利益,而满洲则被认为与欧洲的利益关系不大。在日内瓦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当一个弱国和军事强国发生冲突时,国联无论如何很难公正加以解决,但如果双方都是强国或都是弱国,那么就比较容易解决。假如正像所说的那样,那么这次摆在国联面前的任务比满洲问题要简单得多,因为中日两国,一弱一强,相差太远。

国联秘书处的高级官员向我保证说,这一次国联的原则将被维护,国联的荣誉和尊严将被重塑;英法立场坚定,将会坚决联手反对意大利的侵略行为。还说如有必要,两国都准备对侵略者采用盟约第十六条进行制裁。利用过去中国的经验,英国从一开始就援引盟约第十五条,并且,立即果断地将争端提交给大会。但

是,人们能够感觉到很多会员国代表在表述他们的态度时相当犹豫和谨慎,一部分原因也许是他们不能肯定所谓的英法联手,另一部分原因是先前满洲问题提交国联大会时,英法两国的态度和政策已使他们大大失望和泄气。很多中立国代表在先前的满洲问题上,曾非常坦率、毫无顾虑地表明他们的观点,积极支持国联的原则,坚决反对侵略。

在大会一般辩论时,按惯例,中国代表的发言排在第十位。发言排序是有必要的,因为各代表团都想让自己的代表尽早发言。这一次,却使我们大吃一惊,会议安排我们的发言紧接在英国之后,而英国向来是第一个发言的。英国外交大臣就阿比西尼亚遭受侵略问题发言时,语气抑扬顿挫,坚定有力,与会代表对他的发言印象极佳。我们在发言中则强调指出,正在阿比西尼亚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又一个满洲事件,这是国联在对待侵略问题上,不能也不愿按照载入国联盟约的原则来处理的必然结果。我们希望这一次能采取明确而有效的措施来加以解决。

与会代表们渐渐意识到,事情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安排在第二天上午的法国政府代表的发言。当法国代表赖伐尔发言完毕后,听者的脸上都出现了惊讶与迷惑的神情,他有一段重要的话使用了一连串的反问句,好像让听者自己去决定他对这一问题究竟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但是,代表们并不难得出结论,两个大国对局势的看法与采取的手段显然是不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会员国代表变得更加担心和忧虑,生怕他们自己深陷于这场争论中,因为意大利不比日本,毕竟是欧洲的一大强国,开罪不得的。

从第二天开始,事情已经明朗化了,这一争端的结果将与中日冲突的结果毫无二致,也将进一步削弱国联的地位和成员国及世

界对它的信任。在此,我实无必要叙述全案在国联的经过,但有必要说说后来某国外交部长对我所说的话,他关于制裁问题的评述虽很刻薄,但点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提出对意大利实行经济性质的制裁,是无可非议的,但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总的来说,成员国中不产石油而大量产煤的国家,主张禁运石油,反之,则主张禁运原煤。他还说他的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是无可指责的。

赖伐尔那时执掌法国,并且是亲意大利的,当然不会得罪他的意大利朋友,而英国如若没有法国的全力支持,将难以号召欧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再者,英国人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Sir Eric Drummond)已从国联秘书长的位子退下来,他的继承人是法国人阿弗诺尔(Avenol)先生,他自然是站在法国立场上的。关于阿弗诺尔出任秘书长,是在1932年国联行政院经几次“秘密”会议后决定的,我当时也出席了那些会议,事情的经过颇可回味,足以表明国际政治是如何斗法的。有一个欧洲小国的代表,很想努力制止为使阿弗诺尔出任秘书长而在背后所搞的交易,但他无力达到他的目的。

在经柏林返回莫斯科的旅途中,我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稍作逗留,主要是访问那里的中国学院。我在柏林时曾见过该院院长,该学院副院长是丁(文渊)博士,即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博士的胞弟。我用整个上午察看了学院的建筑,中午,学院委员会成员应我之邀在我下榻的宾馆共进午餐。我们讨论了他们的工作,以及如何使德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如何帮助在法兰克福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等等,他们的职责与纽约的中国学院是相同的。

那时,著名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先生正在附近的温泉疗养,我

去造访两次,与他一起度过两个晚上。第二次去时,时任国际法庭法官的王宠惠博士也在场,他是从海牙来的。胡先生虽经当地名医诊治,但看得出他仍病得很厉害。他的神经很脆弱,出门不能乘坐汽车或火车,因此我建议他坐船沿莱茵河南下到荷兰,再从荷兰搭乘海轮经意大利回国。但是,他在到达香港后不久就去世了,他再也没能看到南京,他曾非常希望王宠惠博士和我都能与他一起回国参加政府工作。

过去我只是在南京见过一次胡先生,那时,他政治上不得志,独自住在一幢半西式的房屋里,根本不出门。我对他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他邀请我进屋倒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知道他正感觉不适,不见客人。在我们谈话当中,我谈及俾斯麦遇到久留不走的访客时,他的夫人就走进房间轻轻地对他说,服药的时间到了,于是,访客就知趣地告辞了。正说着,胡先生的女儿端着一杯杏仁茶进来送到他父亲面前,我也就笑着告别了。

这一次访问使我想起了另一次访问,那是在1932年对德国南部一个小镇的访问,小镇的名字叫蒂宾根,汪精卫因病正在那里接受治疗。他住在一所私人疗养院里,由他的秘书陪伴,那天上午,他只能见我几分钟,因为他刚服了药,需要平卧。我是经苏黎世到蒂宾根的,时值圣诞节假期。途中我对德国南部的情况有了些了解,境内公路的质量是一流的,这些公路是利用在美国发行市政债券所筹集的资金修建的(至1941年时还未偿还)。我们在斯图加特稍作停留,然后向西,进入了一战后德国归还法国的地区,我们参观了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在餐馆,服务员对我们讲话时更愿用德语,但当法国官员一进来,就改口讲法语。很多街道多采用法文命名,如:“共和国街”、“克莱蒙梭街”、“彭加勒街”,等等。我们

从巴塞尔又进入瑞士,经伯尔尼返回日内瓦。

1935年,国内的形势日趋恶化,日本通过在华北炫耀武力,成功地导致了《何梅协定》的签订,我国在华北的主权进一步被剥夺了。我给政府发了一封电报,抗议南京那些根本没有外交谈判经验的文武官员代表不断作出的迁就让步。在另一封发给外交部长的电报中,我建议在这场冲突中,我国应争取国际上的友好援助,但给我的回答真是出奇,说什么在我们当前的情况下敲锣求援(像是遇到抢劫时),那太危险了。换句话说,我们就应该悄悄地放弃我们的主权和领土。

我深感这样下去,自己难以对国家有所作为,加上莫斯科艰苦的生活条件,我的健康开始受到影响。我决定在使馆度过60岁生日后就退休。这样,我就恐怕不能再访问欧洲了,因此我很想再有一次会议,好与在巴黎和伦敦的同僚们见见面,这年年底,刚好中国艺术展览在伦敦柏灵顿大厦举行,我利用参观展览的机会飞往巴黎,转飞伦敦。

另外,我一直想要访问西班牙,此次,我的同僚、我国驻西班牙公使使用两周时间陪我游览了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西班牙各大城市。我很幸运作了这次访问,那时,西班牙即将进行大选,这次选举最终导致了国内战争,毁坏了许多名胜古迹。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我最后一次从莫斯科去柏林的途中,火车上曾发生的一起国际事件,其虽不是什么大事,但实属罕见。在我的包厢隔壁,有两个日本人,一个是莫斯科日本使馆的年轻馆员或秘书,另一个后来得知是新闻记者。当火车到达苏联边境时,海关关员像通常那样上车检查旅客证件和所有的行李,除了享有外交豁免权的旅客外,其他旅客的行李都必须搬到车站去接受检查。

他们在我隔壁的包厢里停留了挺长时间,好像为什么事情与我的邻居,即那两个日本人发生了争议,但最后他们走了。我担心火车若还不开,到边界那边的波兰车站要晚点了,所以到走廊里去打听怎么回事。隔壁的日本人显然焦虑不安,并开始告诉我他遇到的麻烦。

看来是因为海关关员坚持他的行李要搬到车站去检查,但他坚持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权。海关关员告诉他,根据铁路规定,他不能将这么大的皮箱放在包厢里,他说他是外交信使,可是却拿不出证件来。

他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建议他可以对海关关员说,要打长途电话给大使,得到大使允许后才能放弃外交豁免权。我还说,当然最终的结果就看箱子里是否有苏联国法不容带出国境的东西,比如,保密的军事性材料之类。他否认有保密的东西,但也不愿意说出箱子里究竟是什么。

过了一会儿,海关关员又来了,还有车站站长,接着他们就采取很奇怪的做法。车站站长走到我跟前致礼并解释说,我们乘坐的车厢的一个轮子有点问题,我们必须换另一节车厢,并很有礼貌地告诉我已为我准备了包厢。与此同时,一个车头把我们乘坐的车厢拖到了不远处的一条支线上,我们下了车,往回向新车厢走去,我们的行李由搬运工扛着。

路上,扛着日本人的大皮箱的那个强壮的搬运工,假装皮箱从肩上滑下来,跌落在尚有些积雪的高低不平的路面上,其实,皮箱是被很猛地摔在地上。可是,皮箱特别结实,先后摔了三次,摔不开,而车站站长在旁怒骂搬运工如此不小心。最后,皮箱还是搬到车站去检查了。

我的行李是免检的,直接搬上新车厢我的包厢里。又等了很长时间,车还不开,我不耐烦地到车站上去问究竟什么时候开车,因为再晚的话就赶不上波兰车站发出的车了。车站站长再一次对我表示歉意。

最后,两位日本人回来了,他们显然与边防检查站经过长时间的谈判,那位年轻的秘书对我说,他继续前往柏林,但不能带他的箱子了。后来我知道,海关关员不顾这位年轻外交人员的抗议,打开了他的箱子,发现里面装的不是军事地图或秘密发明之类的材料,而是一位苏联姑娘,是他的私人秘书。因为这一事件,我们没赶上波兰快车,到达柏林时晚了好几个钟头。那位浪漫的年轻秘书被其政府召回,在莫斯科再没见到他。

我在欧洲的最后两个月里,身体完全垮了,神经衰弱得特别厉害。先在柏林的一个疗养院里疗养,并有名医治疗,医生说我的病不是器质性问题,只是功能紊乱,主要由于劳累过度、环境欠佳、生活孤单、思虑太多造成的,此外,也有更年期的影响,有的男子也有更年期问题。

鉴于我的身体状况,医生建议我在回国前的几个星期到意大利蒂罗尔的梅拉诺去住上一段时间。那是一个著名的疗养胜地,坐落在山谷中,山上终年积雪不化而山脚下却盛开各种鲜花,苹果树、梨树和桃树等也群芳争艳,特别是疗养院花园里的两棵木本牡丹真是令人叫绝,还有古老的紫藤爬满墙壁,高至几层楼,一串串紫藤花从门廊顶棚边沿和阳台四周垂挂下来。在中国,紫藤花可以食用,加上白糖可做成饼馅。

山区的空气对我并不合适,我的神经衰弱越来越严重,我几乎连续走不了几分钟,而这里的山路也使我更感劳累。我还患失眠

症,虽然服用了特效药,还洗温泉浴等,但仍不能入睡,痛苦不堪。在我离开疗养院回国前,请柏林的名医来为我作最后检查,他再一次要我相信,一到新加坡,我的病就会好一半,到了上海就能基本痊愈,然后在家庭的怀抱中会逐步完全康复。

我在一位私人医师、我的秘书和我侄子的陪同下,搭乘德国“沙恩霍斯特”号邮船,开始了归国的旅途。的确,邮船越接近远东,我的感觉越好,最后,医生的预言全部兑现了。在上海小住之后,就直接回到天津,因身体虚弱,中途没能在南京停留和向当局述职。

在家中休养几个月之后,我完全恢复了健康。我所得的这种病曾使我颇感身体不适和精神痛苦,备受煎熬。如有机会,我想写下病中的经历和我与病魔作斗争的努力,有些努力很成功,我已对不少患此病者说过。